
老革命的新觉醒

——《炎黄春秋》评析——

刘志琴

〈LIU Zhiqin,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〉

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办刊物，是由民间人士自筹资金、自行设计，面向市场的期刊。按照共产党的传统观念，报刊属于意识形态领域，是国家和党的宣传工具，素来由政府投资，委派办刊人员，是官办的事业机构，民间没有插手的余地。民办刊物所以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出现，首先得力于改革开放以后相对宽松的环境。虽然民办刊物仍然要接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和规范，但毕竟这是与官办不同的民间组织，它表明民间力量可以在国家体制以外生存、发展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呼唤民间力量的壮大，促进体制的改革，所以它的意义不仅在刊物本身，而是体制的突破，在大陆的改革和思想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笔。

时下这类民间刊物如雨后春笋，发展很快，但绝大多数都以赢利为目的，是商业性、游乐性的，真正属于思想性或学术性的民间刊物还是凤毛麟角，即使这为数极少的刊物，也难以长期存在。以社会文化批评为导向的《东方》杂志从1993年创刊后，只存在了三年，就被迫停刊。目前在民众中拥有很高声望，独立运作而又硕果仅存的，只有《炎黄春秋》一家。

这一家又属另类刊物，说是另类，因为该刊力主“求实存真”，倡导“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”，“对事对人，说实话，说真话，客观，公正，经得起时间检验，经得起历史检验。”以春秋笔、古今谈、他山石、古镜台、群言堂、求实篇、英杰谱、殒星篇等栏目，揭示历史尤其是当代史的真相，由此可见这以论史为主的结合性月刊，又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参与性。更重要的是在办刊宗旨上，这样开总明义的表明，不唯上，不唯权势，秉笔直书，以追求历史真相为本务的方针，在大陆极为罕见。

《炎黄春秋》(下述简称炎黄)从1990年创刊，每月1期，至今已出133期，2800多篇文章，1600余万字。在民众中拥有很好的口碑，许多读者表示：“每期必读，通读”；“每册总要传阅十几甚至数十人”；“全家老少都看”；有的拿到刊物“竟连饭也不吃，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”；有的自编目录供人查阅；有的自制合订本在朋友中流传：天津古旧书籍市场还将该刊列为收藏品，受到顾客的欢迎；有的兄弟报刊还登门求教如何做到讲真话的经验。在大陆宣传主旋律的报刊大多由公家订购，《炎黄》完全凭自费订阅，像这样《炎黄》迷的订购者，已近七万户。

这样一种深受民众欢迎的刊物，道路并不平坦，2001年该杂志社的社长说：“十年来在叙事叙人时，不断发生敢不敢、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。有时处境相当困难。”这种困难如果在其他刊物，也许早已偃旗息鼓，但《炎黄》任凭风吹雨打，岿然不动。其中重要的原因是，这是由一批已离休的党政军领导人发起和支持的刊物，这里由军队上将、国务委员、中共顾

问委员、宣传部长、安全部长、省委书记，以及新闻出版署署长、光明日报总编、新华社党组书记等文化界的要人，虽然他们已离开权利的中心，但影响还在，尤其是对民众、民生问题的参与，使他们在民众中的威信持续上升。刊物还拥有一批不可多得的作者队伍，如李锐、师哲、萧克、李德生、伍修权、莫文骅、于光远、任仲夷等，其中有长期担任中央或地方领导的老革命。他们都是高层动态和若干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，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受过“左倾”路线的摧残迫害，对左的祸害与老百姓的甘苦有深切的体会，所以能以亲身经历提供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，勇敢地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让真相打败于天下。

这批党政军的领导者对知识界有很深的情感，原中国共产党顾问委员杜润生明确表示：“现在中国社会有这么一批知识分子，这么一群通晓历史的文化人，他们需要一千发言的地方，一千活动的空间。这个刊物就担负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责任。”“要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，最要紧的，是有言论自由，有学术自由，有产权保护制度。”许多著名学者戴逸、张岂之、李学勤、冯其庸等也都参与其中，像这样联合党政军学界要人共同支持和组建的刊物，在中国当属首屈一指。

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来自刊物敢于说真话的勇气和精神。能不能讲真话，在中国是一大难题，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，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打成右派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，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讲了真话。讲真话的下了地狱，讲假话的就可能青云直上，以至谎言、假话贻毒天下，使民众深恶痛绝。《炎黄》正是以讲真话，赢得众望。

说真话，最难的是对共产党的失误、教训，作出痛切的反思。正如杂志社社长所说：“说我们的党呢，只能讲成就与经验，如果讲缺点、错误与教训，便好像是给自己脸上抹黑。总之，这种片面的、非科学态度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泛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，史学领域更加严重。这种情况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有了很大改观，但那种非科学看人待史的心态仍残存着直到今日。”《炎黄》迎着这一困难而上，首先对蒙诬受免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、张闻天、鼓德怀、黄克诚、瞿秋白、李立三、项英、潘汉年、陈昌浩等进行钩沉发微，揭开铁血帷幕，阐明他们的真实功绩。在1989年以后中国报刊已不再提胡耀邦的情况下，《炎黄》于1994年4月，首先刊载纪念胡逝世五周年的诗文，并连续发文对胡耀邦推进思想解放，平反冤假错案中的赫赫功绩进行系统的评价，受到读者的高度赞扬。刊物不仅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部长、省委书记如闫红彦、江渭清、卫恒、陶勇、万晓唐、张霖之等平反昭雪，也有为平民百姓伸张正义的篇章。对某些政治运动的真相，言之凿凿，道出事情的原委，还历史的本来面貌。从1958年到1962年，中国历经大跃进的狂热、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和七千人大会，云谲波诡，留下许多不解之谜，《徐水，梦幻的天堂》、《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》、《最早为包产到户呼吁的两个年青人》、《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抗争》、《“七千人大会”的勇气与遗憾》等发表在《炎黄》上的系列文章，揭示了从中央到底层的历史真实。《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》、《李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》、《粟裕对中央战略决策直陈异见》、《陆定一推行“双百”方针始末》、《从“公共食堂”兴衰引发的思考》以及对马寅初、王造时等人的再评价，如实地反映了共产党内外老一代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实践和理论思考。这些使人震聋发聩的文章，被读者誉为“醒世名篇”，在民众中不经而走。

对于《炎黄》敢于发表别人不敢说的言论，也有人道出自己的隐忧，李普说，萧克将军“是这份杂志的灵魂和支柱。听说有些很好的文章，是有赖他的支持才登出来的。写到这里，我忽发奇想，如果没有萧老，我们能看到如今这样的《炎黄春秋》吗？”

这一隐忧也许是多虑，因为当今共产党内已出现老革命的新觉醒，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就追随共产党，忠诚于党的事业，长期以来习惯于以党的利益为重，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专制主义的影响，成为党的驯服工具，鲜有个人的自主意识。文革浩劫和共产党的屡次失误，使他们经历了信仰的动摇、徬徨和重新组合，找回自我，再度扬起他们早年追求而又一度失落的民主旗帜，痛感社会主义传统体制的弊端，奋力追求改革。然而长期的革命生涯，又使党的命运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，尽管他们有种种被人视为离经叛道的言行，但这一切都旨在力图以最小的代价，从体制内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。这表明共产党民主派的崛起，清醒、准确地说，他们是共产党的补台派而非拆台派，所以他们并不是自由主义者，但在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根底的条件下，他们有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，这也是《炎黄》的支持者李慎之成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原因。这是历史的错位，也是现实力量对比的结果。

《炎黄》13年的业绩表明，它的发展不仅受惠于个人举足轻重的影响，也是群体力量凝聚的展现，当局已不能轻忽它的存在，以致当刊物再次遭遇困难时，上级主管也不得不发话说：“《炎黄春秋》不能停刊，如果停刊可能会变成政治事件。”尾大不掉，无可奈何，这也表明它的价值将会在中国改革史上永远闪耀。